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Distr.: General
24 December 201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禁止酷刑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通过的关于第 855/2017 号来文的决定* **

来文提交人: Susith Wasitha Ranawaka(由律师 Michaela Byers 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澳大利亚
申诉日期: 2017 年 11 月 20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15 条作出的决定, 已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19 年 12 月 5 日
事由: 递解回原籍国后可能遭受酷刑(不推回); 预防酷刑
程序性问题: 可否受理——明显缺乏证据
实质性问题: 将申诉人递解至斯里兰卡
《公约》条款: 第 3 条和第 22 条

1. 申诉人 Susith Wasitha Ranawaka 是斯里兰卡国民, 1977 年 9 月 16 日出生。他出生在南方省马特勒, 是僧伽罗族, 信仰佛教。他在澳大利亚的庇护请求被拒绝, 已收到移送至斯里兰卡的递解令。他声称, 递解回斯里兰卡后他可能遭受酷刑, 这违反《公约》第 3 条。缔约国已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1 款作出了声明, 自 1993 年 1 月 28 日起生效。申诉人由律师代理。

* 委员会第六十八届会议(2019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月 6 日)通过。

** 参加审议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 艾萨迪亚·贝尔米、费利斯·盖尔、阿卜杜勒瓦哈卜·哈尼、克劳德·海勒·鲁阿桑特、延斯·莫德维格、阿娜·拉库、迭戈·罗德里格斯-平松、塞巴斯蒂安·图泽和巴赫季亚尔·图兹穆哈梅多夫。



申诉人陈述的事实

2.1 2003 年至 2012 年，他在斯里兰卡 Henegama Akuressa 茶叶合作社从事工厂管理工作。他的叔叔 Bandu Ranawaka 在该合作社中具有影响力，因为他是国家合作社发展委员会和国家合作社理事会的主席。申诉人、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 Bandu 曾是斯里兰卡自由党激进分子。到 2004 年时，斯里兰卡自由党已经与几个小政党组成了联盟，名为统一人民自由联盟。申诉人参加了该联盟的各种活动。

2.2 到 2010 年议会选举举行时，申诉人已对斯里兰卡总统不满，转而效忠统一国民党。在 2010 年竞选期间，申诉人遭到不明身份人员的枪击，推测是统一人民自由联盟的支持者。他还在工厂里收到了死亡威胁。在竞选期间，他被联盟的支持者绑架和殴打，他们向他施压，要求他重返联盟。他试图向警方投诉，但被告知停止羞辱政府。他继续受到骚扰，包括接到公共行政部副部长 Dahanayake 的电话，并被停职。甚至在他离开斯里兰卡后，他的妻子告诉他，刑事调查局的官员曾到访，并询问他的下落。

2.3 申诉人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乘船抵达澳大利亚圣诞岛。2012 年 6 月，他提出保护签证申请。澳大利亚移民与边境保护部长的代表于 2012 年 10 月 1 日拒绝了他的申请。他请求难民审查法庭审查该决定，法庭于 2013 年 2 月 22 日宣布维持原先的拒绝结果。2013 年 3 月 22 日，他就该决定向联邦巡回法院提出上诉，联邦巡回法院将案件发回难民审查法庭。2014 年 8 月 19 日，法庭再次维持代表最初的拒绝结果。2014 年 9 月 17 日，申诉人向联邦巡回法院申请对该决定进行司法审查。他的申请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被驳回。2016 年 10 月 26 日，他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联邦法院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驳回了申请。他向高等法院提出特别上诉许可的请求于 2017 年 10 月 12 日被驳回。2017 年 11 月 8 日，他请移民与边境保护部长进行干预，但他的请求在 2017 年 11 月 9 日被驳回。申诉人表示他已用尽了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2.4 申诉人提出，在难民审查法庭进行第二次听证后，他的母亲通知他，公共行政部副部长 Dahanayake 对他提出了控告。他的叔叔 Bandu 打来电话，告诉他不要担心，并表示，鉴于申诉人不在，控告自然会消除。2014 年 8 月，在难民审查法庭作出第二次裁决后，申诉人获得了 Dahanayake 提出的控告的副本，其中他被指控滥用茶叶合作社的车辆进行政治活动和破坏工厂机械。申诉人说，他与 Dahanayake 的冲突可以追溯到 2009 年，当时他的叔叔和 Dahanayake 成为政治对手，竞选统一人民自由联盟的省议会候选人。即使在 Dahanayake 赢得选举后，政治竞争仍在继续。

2.5 鉴于这一新证据以及基于对该联盟针对他的确切动机的猜测，申诉人认为，这些攻击的主要目标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叔叔 Bandu。Dahanayake 不仅希望解除申诉人的叔叔 Bandu 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能力，而且还想羞辱他。Dahanayake 对 Bandu 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其中一次是攻击 Bandu 的侄子兼政治生涯中的合作者，他比 Bandu 弱小。尽管 Bandu 得以逃脱针对他的敌对行动，但他受到削弱，保护他侄子的能力也降低了。

申诉

3.1 申诉人声称,将其递解回斯里兰卡将侵犯其根据《公约》第 3 条享有的权利。他争辩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叔叔的政治对手,公共行政部副部长会试图伤害他,以此作为伤害他叔叔的一种手段。Dahanayake 对申诉人提出的控告表明了这一意图。由于《斯里兰卡刑法》将破坏政府财产定为刑事犯罪,申诉人声称,如被遣返斯里兰卡,他将面临真实的监禁风险。他还声称,由于斯里兰卡的拘留条件恶劣,任何长期拘留本身都可能构成不人道待遇,¹ 并进一步声称,作为审讯手段或因 Dahanayake 下令而使他遭受酷刑的风险很高。他提出,殴打被羁押人在斯里兰卡不仅司空见惯,而且也是标准化做法。

3.2 申诉人还声称,作为一名失败的寻求庇护者,有受到伤害的风险。由于他是船上唯一的僧伽罗人,船上另有 98 名泰米尔人,斯里兰卡当局会怀疑他帮助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的同情者逃离该国。

3.3 申诉人还就难民审查法庭的第二次听证和裁决提出了几项申诉。首先,他争辩说,法庭错误地驳回了他对保密的关切,尽管他不相信澳大利亚当局不会向斯里兰卡当局透露对他有害的信息。当法庭问及此事时,他不能回答,因为他认为这样做会是一种蔑视行为。第二,法庭没有考虑到统一人民自由联盟骚扰申诉人的其他可能动机,如报复。最后,法庭错误地认定 Bandu 是联盟中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可以保护申诉人。虽然法庭援引亚洲人权委员会 2013 年的一份报告指出, Bandu 攻击他人而不受惩罚,从而认定他有足够的影响力来避免问责,但申诉人认为,这其实表明 Bandu 在联盟中的地位正在削弱,他变得易于受到一名更有权势的联盟成员捏造的这种指控伤害。法庭还错误地以他在澳大利亚没有政治活动为由拒绝他的申请,因为这一推理没有考虑到联盟伤害他的意愿并不取决于他目前的政治活动,而是取决于他与他叔叔的关联和过去的政治联系。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及案情实质的意见

4.1 2018 年 5 月 30 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来文可否受理和案情实质的意见,指出申诉人的诉求因属事理由和明显没有根据而不可受理。然而,如果委员会认为申诉人的指控可以受理,则应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予以驳回。

4.2 缔约国辩称,申诉人关于返回斯里兰卡后可能受到伤害的一些申诉并不构成《公约》第 3 条所指的酷刑。他指称,统一人民自由联盟将通过骚扰、法庭诉讼和政治运动针对他,以损害他的叔叔,这些指称因属事理由不可受理,因为《公约》第 3 条规定的不推回义务仅限于有实质理由相信回返者将面临遭受酷刑危险的情况。缔约国还提出,委员会为了确定是否涉及第 3 条,对酷刑和未达到这一门槛的待遇,包括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有所区分。因此,缔约国认为,申诉人关于据称对他提起的法庭诉讼和企图破坏其叔叔政治生涯的申诉没有达到这一门槛,因此不涉及第 3 条规定的不推回义务。

¹ 见真相和正义国际斯里兰卡项目,“不间断:2016/17 年度斯里兰卡的酷刑状况”(2017 年 7 月)。

4.3 缔约国还提出，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13(b)条，申诉人的申诉明显没有根据因而不可受理，因为他未能就可受理的目的提供足以确认事实的证据。已经在一系列国内程序中彻底审议了他的申诉，并认定本案不涉及《公约》或《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不推回义务。健全的国内程序审议了这些申诉，并确定它们不可信。此外，申诉人在给委员会的来文中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信息。缔约国提及委员会关于参照《公约》第 22 条执行第 3 条的第 1 号一般性意见(1997 年)第 9 段，其中委员会指出，由于委员会不是一个上诉或准司法机构，它相当重视缔约国机关得出的事实调查结论。²

4.4 缔约国指出，对申诉人的申诉可否受理进行透明和合理的审议是个人申诉程序的一个关键程序要素，对于申诉框架的成功至关重要。缔约国还指出，在委员会最近通过的某些意见中，针对缔约国关于申诉人的申诉因属事理由或明显没有根据而不可受理的详细陈述，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提出的问题与案情实质密切相关。缔约国指出，委员会有必要按照议事规则的要求审议和确定缔约国的意见，即提出明显不属于《公约》第 1 条中酷刑定义范围或明显没有根据的指控的申诉不可受理。在此基础上，缔约国请委员会具体考虑并答复缔约国关于申诉可否受理的主张。缔约国还提出，如果委员会认为来文可予受理，申诉人的申诉也没有法律依据。

4.5 缔约国回顾，澳大利亚移民与边境保护部部长的代表于 2012 年 10 月 1 日拒绝了申诉人的保护签证申请。该代表不接受他的一些申诉，包括统一人民自由联盟会在他离开该党后恳求他返回，以及他曾被联盟拘留。虽然该代表承认他可能参与了联盟，并且如果他真的转向支持反对党，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但不认为他的政治身份地位足以引起对他的持续不利关注。该代表还注意到，自从他转变政治归属以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不利行动。该代表进一步认定，申诉人是僧伽罗族佛教徒，不是当局在其返回斯里兰卡后会针对的人，尽管他在抵达后可能会受到例行讯问，但这种讯问并不构成真正的严重伤害风险。

4.6 缔约国提出，法庭在维持最初的拒绝结果时认定，申诉人在政治派别归属方面混淆不清，表明他对其据称支持的党派一无所知。尽管他声称自己是所在社区的青年领袖，但当被问及他的追随者对他政治归属的改变作何反应时，申诉人似乎没有特别考虑过这个问题。在联邦法院发回案件后的第二次裁决中，法庭指出，申诉人在据称成为统一人民自由联盟敌视的对象后，仍在斯里兰卡待了两年多。法庭还指出，尽管国家信息表明，该联盟在 2011 年经常因政治原因逮捕和监禁个人，但没有人试图逮捕或严重伤害他。审查法庭还发现，他在澳大利亚期间在政治上不活跃；该联盟仍然是执政联盟，不需要申诉人的支持；他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表明 Dahanayake 对他构成威胁。

² 禁止酷刑委员会关于参照《公约》第 22 条执行第 3 条的第 1 号一般性意见(1997 年)被关于参照《公约》第 22 条执行第 3 条的第 4 号一般性意见(2017 年)(CAT/C/GC/4)取代，自 2017 年 12 月 6 日起生效(第 3 段)。

4.7 缔约国还指出，申诉人在 2017 年 11 月 8 日提出的部长干预请求中首次声称，他所说的该联盟针对他的做法是毁掉他叔叔政治生涯的运动的一部分。移民和公民部决定不将此事提交部长，因为该请求没有显示出独有或特殊的情况。

4.8 缔约国注意到，申诉人在其部长干预请求和给委员会的来文中，就难民审查法庭关于发回重审的行为和调查结果提出了几项申诉(见上文第 3.3 段)。首先，缔约国坚称，在法庭听证时，申诉人本可以通过其代表申请法庭授权发布保密令，但他没有这样做。缔约国提出，法庭在其第二次裁决中明确考虑了为保护他的保密性而采取的步骤。法庭还允许申诉人提供出于保密考虑而没有提交的证据，因此，他提供了关于其叔叔的书面证据。申诉人没有声称，如果这些补充证据在第一次听证期间提交，本可改变法庭的决定，也没有声称还有更多的证据他出于保密考虑未曾提交给法庭。此外，他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表明法庭违反了《移民法》规定的义务，即不发表任何可能表明申请人或其亲属身份的声明，或任何其他保密规定。第二，与他的指控相反，法庭明确指出报复可能是联盟过去骚扰申诉人的原因，并认为这是针对他的一个潜在动机因素。然而，法庭发现，由于他离开斯里兰卡后很少开展政治活动，今后对他进行任何报复的可能性都降低了。最后，缔约国坚持认为，申诉人基于与其叔叔的联系所称的伤害风险不足以构成充分的理由让人相信，如果被遣返斯里兰卡，他本人将面临遭受酷刑的危险。

4.9 关于对个人遭受酷刑风险的评估，缔约国提出，普遍存在暴力风险并不构成确定某人被遣返回该国后将面临遭受酷刑危险的充分理由，申诉人也未能证明存在其他理由，表明如果他被遣返斯里兰卡，将面临遭受酷刑的可预见、真实和针对个人的风险。缔约国重申，国内程序对申诉人提出的有关遣返寻求庇护者和斯里兰卡境内侵犯人权的问题进行了具体、仔细的审议，包括对照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国家政府外交部提供的国家信息进行了审议。³

4.10 缔约国的结论是，申诉人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表明，一旦返回斯里兰卡，他个人将面临《公约》第 1 条规定的构成酷刑待遇的风险。

申诉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19 年 3 月 31 日，提交人就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实质的意见作了评论。申诉人反驳缔约国关于他没有向委员会提供任何相关新信息的说法，称他提供了以前没有的关于 Dahanayake 行动的进一步证据。

5.2 申诉人称，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最近袭击了他在斯里兰卡的家。他还提出，2018 年 4 月 15 日，他的叔叔 Bandu 在可疑情况下死亡，Dahanayake 仍然希望进行报复，并将更加关注他。

5.3 关于澳大利亚当局认定他没有重要的政治身份地位，申诉人声称，那些没有这种身份地位的人很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杀害或折磨他是对他叔叔施加重大压力的一种方式，反对者更容易通过骚扰政治家的支持者来破坏其基础支持。申诉

³ 包括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边境管理局、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和丹麦移民局。

人声称茶厂存在问题，反驳缔约国称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事以及当局没有针对他的说法。他补充说，斯里兰卡的政治继续不稳定。

5.4 关于他对自己的政治活动的陈述不具可信度的调查结果，申诉人辩称，斯里兰卡政治多变的性质让他对政党的名称和首字母缩写感到迷惑。他的政治行动是基于他对特定政治人物的忠诚和凝聚年轻人的能力，而不是他对政治思想或政策的了解。他声称能够讨论他工作地区的主要政治行为体，而不必追踪不断变化的政治联盟的首字母缩写。他坚称，澳大利亚当局认为他不可信是因为他没有接受过先进的西方民主进程的熏陶。

5.5 关于他的保密关切，申诉人说，在难民审查法庭的听证会上，他只在三个小时的严苛面谈结束时才被允许与他的代表交谈，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当时没有顾及保密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5.6 申诉人重申他的主张，即他个人的风险与他跟叔叔 **Bandu** 的关系及合作有关。他提出，现在 **Bandu** 已经死亡，人们可能会错误地推断，对他的威胁也已经停止。申诉人提到澳大利亚当局关于 **Bandu** 曾保护他的调查结果，声称他面临更大的伤害风险，因为他不再受到 **Bandu** 的保护。

申诉人提供的补充信息

6. 2019 年 5 月 4 日，申诉人提交了其叔叔的死亡证明，证明指出不能排除中毒是可能的死因。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7.1 2019 年 8 月 23 日，缔约国提交了对申诉人评论和补充信息的意见。缔约国称，申诉人提交的报纸文章的翻译版来源不明，而且翻译版没有得到核证。此外，证人陈述没有经过宣誓或正式确认。缔约国认为，这些问题损害了文件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即使该陈述可信和可靠，鉴于该陈述承认一个“不明团体”实施了所称的破坏行为，也不能得出该行为与申诉人的政治背景有任何联系的结论。此外，此事似乎仍在调查中。因此，缔约国认为这一补充信息不会改变其最初的调查结果。

7.2 缔约国还注意到，死亡证明列出死者为 **Chandrapala Ranawaka**，而申诉人的叔叔在所有国内程序中被称为 **Bandu Ranawaka**。死亡证明上的不同名字似乎不是 **Bandu** 这个名字的变体或昵称，这削弱了申诉人说法的可信度。虽然证明指出不能排除中毒的可能性，案件需要移交进一步调查，但申诉人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进一步调查的证据。缔约国认为，他声称因其叔叔死亡而面临更大伤害风险的说法并不恰当。从逻辑上可推断，如果他的风险是基于他与叔叔的关系，那么鉴于他叔叔死亡，这种风险被极大地限制了。

7.3 关于申诉人关于斯里兰卡政治不稳定的说法，缔约国认为，所有国内程序中都考虑了最新的国家信息，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编制的 2018 年 5 月 23 日的国家信息表明，在斯里兰卡遭受可能构成酷刑的虐待风险很低。缔约国还提供资料，说明对返回斯里兰卡的人采取的程序步骤。

7.4 缔约国注意到申诉人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提交的材料中提出的保护申诉，并坚持认为，在广泛的国内程序中已经评估并驳回了这些申诉。缔约国还指出，他的申诉前后不一致，缺乏可信度，各种国内裁决和审查机制已经处理了这些问题。

7.5 关于申诉人声称，由于难民审查法庭诉讼程序的性质，当时无法顾及保密问题，缔约国重申其立场，即给予了申诉人充分的机会提出任何关于保密的关切。

委员会需审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8.1 在审议来文提交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 22 条决定来文可否受理。按照《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

8.2 委员会回顾，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除非它确定已用尽一切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否则不应审议任何申诉。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缔约国并未以此为由对申诉可否受理提出质疑。因此，委员会认为，第 22 条第(5)款(b)项并不妨碍委员会审查本来文。

8.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主张，来文基于属事理由不可受理且明显没有根据，因为申诉人未能证明有充分理由令人相信，如果他被遣返回斯里兰卡将面临可预见、现实存在、针对个人的真实伤害风险，包括酷刑风险。关于属事管辖权问题，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主张，如果被遣返斯里兰卡，他将面临被拘留和遭受酷刑的风险。委员会认为，这些申诉可能提出了《公约》第 3 条下的问题。委员会据此认为，申诉人根据第 3 条提出的主张基于属事理由可予受理。委员会还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申诉人已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根据《公约》第 3 条提出的说法，即如果他被遣返斯里兰卡有遭受酷刑和虐待风险，原因是他过去的政治活动以及他与其叔叔的关系及合作，他的叔叔是敌对政治运动的目标。

8.4 委员会认为在受理方面不存在障碍，因此宣布来文可予受理，并着手审议案情实质。

审议案情实质

9.1 委员会结合各方提供的所有资料，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审议了来文。

9.2 本案中，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是，将申诉人强行驱逐至斯里兰卡是否构成违反《公约》第 3 条规定的缔约国义务，即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有遭受酷刑的危险，则不得将该人驱逐或遣返(“推回”)至该国。

9.3 委员会必须评估是否有实质理由相信申诉人返回斯里兰卡后面临遭受酷刑的个人危险。委员会评估这一风险时必须根据《公约》第 3 条第 2 款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在这方面，委员会提及它对斯里兰卡第五次定期报告的审议情况，⁴ 其间委员会曾表示严重关

⁴ CAT/C/LKA/CO/5，第 9-12 段。

切有报告称, 2009 年 5 月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的冲突结束后, 警察等国家安全部队仍在斯里兰卡实施绑架、酷刑和虐待行为。⁵ 然而, 委员会忆及, 就个人申诉进行这种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所涉个人在将要被遣返的国家是否面临可预见和真实的遭受酷刑危险。因此, 一个国家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这一点本身, 并不构成据以确定某人返回该国后可能遭受酷刑的充分理由; 还必须提出其他理由表明当事人本人面临风险。⁶

9.4 委员会回顾其关于参照《公约》第 22 条执行第 3 条的第 4 号一般性意见(2017 年), 根据该意见, 委员会将评估“实质理由”, 在委员会作出决定时, 若申诉人被递解, 其根据《公约》享有的权利会因为存在与酷刑风险相关的事实本身受到影响, 则委员会认为酷刑风险是可预见、针对个人、现实存在和真实的。针对个人的风险迹象可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况: (a) 申诉人的族裔背景; (b) 申诉人或其家庭成员的政治派别或政治活动; (c) 被逮捕和(或)拘留, 且无法保证得到公平待遇和审判; (d) 缺席判决; (e) 曾遭受酷刑(第 45 段)。关于根据《公约》第 22 条所提交来文的实质问题, 举证责任由来文提交人承担, 提交人必须提出可以论证的案件, 即提出确凿证据表明遭受酷刑的危险是可预见、现实存在、针对个人而且真实的(第 38 段)。⁷ 委员会还回顾说, 委员会相当重视有关缔约国机关的事实调查结论; 但委员会不受这种结论的约束, 委员会将考虑到每一案件的全部相关案情, 依照《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 自由评估所掌握的资料(第 50 段)。

9.5 在本案中, 申诉人声称, 他如果被遣返斯里兰卡将面临酷刑风险, 因为他在 2010 年将所属政治派别改为统一国民党后, 遭到其前政党统一人民自由联盟支持者的骚扰、威胁、绑架和枪击。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声称, 过去的骚扰实际上是他叔叔的政治对手为毁掉他叔叔的职业生涯而发起的运动的一部分, 而且他现在面临着更大的伤害风险, 因为本来可以保护他的叔叔去世了。委员会还注意到他辩称, 由于他作为一名失败的寻求庇护者的身份, 他有受到伤害的风险, 特别是考虑到他是前往澳大利亚的船上唯一的僧伽罗人, 会被怀疑曾帮助同一艘船上的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的同情者逃离斯里兰卡。委员会还注意到他就难民审查法庭的行为和调查结果提出的申诉(见上文第 3.3 段)。

9.6 然而, 委员会注意到, 缔约国提出, 申诉人没有提供可信证据, 也没有充分证明他所称的如果被遣返斯里兰卡, 他将面临遭受当局酷刑的可预见、真实和针对个人的风险, 而且作为难民身份确定和补充保护程序的一部分, 已经根据国内法并考虑到斯里兰卡目前的人权状况, 对他的申诉进行了彻底审查。委员会还注意到, 缔约国当局认为申诉人可能受到统一人民自由联盟支持者一些骚扰和威胁的情况看似可信, 但指出, 尽管该联盟据称怀有恶意, 并在此期间逮捕和监禁了政治对手, 但申诉人在斯里兰卡多待了两年, 其间该联盟和任何其他当局都没有试图逮捕他, 甚至也没有去过他的家。缔约国还指出, 鉴于他经常在全国各地旅

⁵ CAT/C/LKA/CO/3-4, 第 6 段。

⁶ 见 *S.P.A. 诉加拿大*(CAT/C/37/D/282/2005)、*T.I. 诉加拿大*(CAT/C/45/D/333/2007)以及 *A.M.A. 诉瑞士*(CAT/C/45/D/344/2008)。

⁷ *T.Z. 诉瑞士*(CAT/C/62/D/688/2015), 第 8.4 段。

行，特别是每个周末去科伦坡看望他的妻子，该联盟如果有意伤害他，完全有机会这样做。缔约国当局认为，这种明显对伤害他缺乏兴趣的情况表明，该联盟对申诉人并不怎么在意，或者申诉人受到其家庭关系的保护。缔约国还坚持认为，他所称的由于与其叔叔的关系而面临的伤害风险并不证明存在回国后受到伤害的个人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已不再存在，因为他的叔叔据称是骚扰的实际目标，而此人已于 2018 年 4 月死亡。

9.7 在本来文中，委员会认为，缔约国当局审议了申诉人的陈述和证据以及国家信息，但不接受他关于其过去政治活动和此后受到骚扰和攻击的许多陈述，认为这些陈述前后不一致、缺乏细节且不可信。考虑到缺乏显示斯里兰卡当局对他持续感兴趣的信息，以及他自 2012 年以来在政治上不活跃，缔约国当局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回国后不会因其政治活动而有遭受酷刑的风险。此外，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调查结果，即申诉人未能证明基于他与其叔叔的关系面临遭受酷刑的个人风险，而且有理由得出结论认为，由于其叔叔最近死亡，这种所谓的伤害风险已不复存在。关于这一结论，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没有提供充分的解释，说明为什么叔叔的政敌专门针对他，甚至在叔叔死后还会继续伤害他。关于他作为一名失败的寻求庇护者的身份带来的所谓风险，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当局考虑了失败的寻求庇护者在返回斯里兰卡后可能受到虐待的风险，但不认同他会被怀疑支持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尽管他抵达后可能会受到一些审查。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当局注意到申诉人自己的陈述，即鉴于他是僧伽罗族并且对僧伽罗民族主义政党的一贯支持，这样的怀疑不太可能。根据这些因素，委员会认为，缔约国当局在本案中充分考虑了申诉人的诉求。

9.8 至于申诉人声称难民审查法庭不理睬他的保密关切，委员会就此回顾其第 4 号一般性意见，其中委员会指出，缔约国应通过主管的行政和(或)司法当局对每起案件进行单独、公正和独立的审查，审查应符合基本的程序性保障措施，特别是保证审查过程及时而透明、对递解决定进行复审并使上诉具有暂缓递解的效力(第 13 段)。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虽然申诉人声称，尽管法庭作出了保证，但他不信任法庭的保密程序，但他没有表明法庭对其申请的详细评估如何因缺乏独立性或公正性而受到影响，或者所涉评估明显武断、不公平或者对他来说相当于司法不公。

10. 鉴于上述考虑，根据申诉人和缔约国提交的全部资料，包括关于斯里兰卡整体人权状况的资料，委员会认为，在本案中，申诉人没有履行证明责任，证明将他遣返斯里兰卡会违反《公约》第 3 条。⁸ 此外，申诉人没有证明缔约国当局未能妥善调查他的指称。

11. 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没有提出充分理由使人相信，他在返回斯里兰卡后将面临真实、可预见、针对个人和现实存在的酷刑风险。

12.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行事，认定缔约国将申诉人遣返斯里兰卡并不违反《公约》第 3 条。

⁸ 关于参照《公约》第 22 条执行《公约》第 3 条的第 4 号一般性意见(2017 年)，第 38 段。